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 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丁士军¹, 杨 晶¹, 张科静², 周 晶³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九江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3.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 621 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 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 与征地前相比, 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 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 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 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 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 劳动力规模越大, 失地程度越严重, 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关键词 失地农户; 收入结构变化; 生计;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 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5)05-0001-08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5.05.001

土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计资产。然而近年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的征地造成部分农户失去土地, 失地意味着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给农户的生计结果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大部分失地农户(尤其是贫困的种植户)本身就缺乏足够的资源禀赋和生计资本, 在土地被征用后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生产和生活缺乏有效保障, 同时面临社会排斥和城市适应问题^[1-4], 成为城镇化“红利”受益的边缘群体^[5]。在失地、生计保障缺失和农户异质性等背景下, 不同资源禀赋和生计资本条件下农户收入结构及农户间的分化也进一步加剧, 失地农户需要据此调整生计活动。考察农户失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对认识失地农户生计活动的改变, 从而促进失地农户收入增长和生计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户收入问题进行了

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2 个方面。

第一, 失地前后农户总收入变化(或影响)的研究。例如, 陈砚国等通过徐州东部矿区失地农民的调研发现, 失地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6]; 史清华等基于上海 7 村 2 281 户农民的调查, 认为征地对当地农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 大部分被征地农户收入不降反升^[7]。与之相反, 黄建伟等通过对七省一市的实地调研认为, 土地的丧失导致了一半以上的失地农民收入数额和收入来源减少, 甚至还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8]。还有一部分文献发现征地对不同群体农户总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 张晓玲等认为文化程度较低、社会转型能力较差、消费没有计划和就业创业能力低的被征地群体逐步陷入贫困, 其整体收入水平呈现出了“先高后低”的变化特征^[9]; 张科静等基于湖北、江西和云南 723 户失地农户的调查认为, 征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不同质的, 低收入农户面临着增收困难的问题, 而高收入农户则表现出

收稿日期: 2015-06-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换保障’背景下失地农户的生计重建: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71173239);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投资与家庭贫困缓解的实证研究”(13YB14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征地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 基于九江和襄阳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2015S1217)。

作者简介: 丁士军(1963-),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农村贫困和农村社会保障。E-mail: dingshijun2006@aliyun.com

较大的收入稳定性^[10]。国外研究方面,Pant 等对孟加拉北部及西北部的失地农户和社会边缘化社区的调查发现,随着失地人数的增加,农业雇佣劳动和季节性迁移从事低技术含量活动成为失地群体仅供选择的谋生方式;而水产养殖和相关技术的引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对无地、社会边缘化和极端贫困的社区同样适用^[11]。

第二,失地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研究。例如,成得礼等基于北京、青岛、成都和南宁等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民家庭的入户调查,研究了不同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体制变革状况的失地农民收入转型问题,认为沿海城郊失地农户的非工资收入水平和家庭总收入均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且房租收入和集体资产分红收入是城郊结合部失地农户非工资收入的主要来源^[12];周义等基于武汉三里镇的失地农户调查发现,农地被征收后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原有的持续性农业收益丧失,农户将重构其收入来源渠道,其收入水平、结构都将发生变化。居住在城乡交错区域的部分农户非农收入比重较大,农业收入的下降对其家庭总收入影响较小^[13]。

已有的研究表明,虽然征地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存在内部差异,但是征地增加了农户的总收入,农业性收入在农户收入结构中地位急剧下降,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失地农户收入的构成主体。然而,关于中国失地农户前后收入构成的变化,尤其是区分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来看其前后收入结构及其变化的文献还较为欠缺。失地意味着农户生计资产的重构,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生计资产调整意味着农户生计活动和生计策略的调整,而生计策略调整将造成农户收入结构的调整。针对失地对农户总收入影响的文献已经指出,不同群体失地农户总收入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失地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对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差异。利用课题组在湖北和江西 621 户失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失地农户基本经济情况进行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农户分类方法探讨征地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据此得出结论及政策启示,以期为深入认识失地对农户的影响及政府部门制定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调整政策提供参考。

二、研究数据与样本农户描述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 2013 年 7—8 月组织的农村调查。该研究项目按照经济发展、地理区位和人口分布等因素选取样本省份进行研究;然后,根据选定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选取一个主要城市;接着,在每个选定城市选取 1~2 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开发区;最后,在每个经济开发区内选取最近 3~5 年征地搬迁较为典型的自然村,再在每个自然村按照随机抽取原则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并对其中一部分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本文选取该研究项目在江西和湖北 2 个省的数据进行分析。在 2 个省共获得有效农户问卷调查 621 户,其中,江西调查农户分布在九江市庐山区(144 户)、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129 户)、九江市城西港区(21 户);湖北调查农户分布在襄阳市襄城区(327 户)。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不同性质及收入来源下失地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状况,本文将农户收入结构划分为农业性收入和非农业性收入。其中,农业性收入包含种植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非农业性收入包含非农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非农经营性收入是指农户从事本地或外地个体小买卖、加工和运输等获得的收入。调查数据显示从 2006 年开始被调查区域的征地活动明显频繁,失地农户被征地次数和土地征收面积也较为增加。为方便统计和数据分析,将 2006 年和 2012 年分别作为“征地前”和“征地后”两个时间节点。在此基础上对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在对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分类时,本文采用的依据如下:第一,依据征地前农业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划分农户“兼业程度”。其中,“纯农户”是指征地前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 80% 以上;“农业兼业户”是指征地前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 50%~80%;“非农兼业户”是指征地前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10%~50%;“非农户”是指征地前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低于 10% 的农户。第二,农户“劳动力规模”则依据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来划分。第三,在划分农户“失地程度”时,依据农户失地占有耕地的百分比,将失地农户划分为“轻微失地”(0~10%)、“中度失地”(10%~50%)、“较严重失地”(50%~80%)和“严重失地”(80%以上)。

从调查农户的“兼业程度”看,“非农兼业户”所

占比重最大(约42.0%),其次是“非农户”(26.9%),“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分别占了18.2%和12.9%;从调查农户的“劳动力规模”看,4人的农户占了33.2%,2人和3人的农户分别占了23.2%和24.8%，“劳动力规模”超过5人的农户比重仅为11.4%;从调查农户“失地程度”看,“轻微失地”和“中度失地”农户分别占6.6%和6.9%,而“严重失地”农户所占比重高达76.3%。从调查农户家庭成员属性来看,以群众、汉族、中老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上、已婚的农户居多数,健康状况为“比较好”及以上程度的农民所占比例超过了70%。可以看出,调查农户不仅符合中国农户家庭的总体状况,又具备了失地农民的基本特征。

三、失地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分析

失地前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及其变化状况显示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征地后农户的收入结构发

表1 征地前后农户收入来源结构及其变动值测量

	农业性收入			非农业性收入				总收入/元	
	种植业/%	养殖业/%	合计/元	非农经营/%	工资性/%	转移性/%	财产性/%		合计/元
征地前	21.3	6.8	15 195.3	16.7	50.4	3.8	1.1	38 908.5	54 103.7
征地后	1.3	2.1	1 918.0	18.7	69.8	5.7	2.4	54 974.5	56 892.5
变动	-20	-4.7	-13 277.3	2.0	19.4	1.9	1.3	16 066.0	2 788.8
<i>t</i> 检验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营性收入比重变动并不显著^①。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征地前后不同收入来源的农户收入变动情况是不同的。那么,有哪些因素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贡献较大呢?采用*t*检验对发生显著变动的收入构成项目进行了分析(表2),结果表明,征地后农户的农作物产值、家畜养殖产值、本地非农打工收入、外地长期打工收入、政府事业单位工资、救济、离退休养老金、利息收入和租金收入等指标均发生了显著性变动;本地农业打工收入、农业补贴和受赠,以及股息、红利收入等指标并未发生显著性变动。另一方面,征地后农户农作物产值和家畜养殖产值下降最为显著,分别减少了12 397.6和2 752.1元。此外,本地非农打工收入和外地长期打工收入的数额增加最为显著,分别增加了8 935.7元和1 959.5元;政府事业单位工资、离退休养老金和租金收入次之;虽然农户的救济和利息收入也发生了显著性差异,但两者增加并不明显。以上数据显示,征地后,农户农作物和家畜养殖产值及

生了明显的变动,且各项收入来源的变动状况具有差异化特征。首先,从收入总体结构上来看,征地后农户总收入上涨了2 788.8元,累计增长率为5.2%,*t*检验结果显示,农户总收入的增长并不显著。其次,从各项收入来源分布来看,农户农业性收入下降明显,非农业性收入上升明显,二者变动较为明显。其中,农户农业性收入减少了13 277.3元,降幅为87.4%,而非农业收入增加了16 066元,涨幅为41.3%。农业性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分别减少了93.5%和68%。农户的各项非农业收入则增加显著,尤其是财产性收入涨幅高达129.3%,其次是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后是非农经营性收入。从各项收入来源比重变动情况来看,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比较明显。比如,种植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的比重分别降低了20.0%和4.7%,而非农业性收入的总体比重上升到了96.6%,其中工资性收入比重增加最为显著(增加了19.4%),非农经

收入下降,本地非农打工收入、外地长期打工收入、政府事业单位工资、离退休养老金以及租金和利息收入增加;本地非农打工收入、离退休养老金和租金收入对农户非农收入增加的贡献最大。

以上分析表明,征地并没有给失地农户总收入带来“扩张式”增长,但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却是较为显著的,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失地农户收入来源的主体。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和社会分层程度的加深,征地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失地农户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事非农活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应可能会逐步增强,在此过程中,征地对农户失去土地后的生计状况的冲击将会日益明显。

四、不同类型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变动差异分析

尽管从总体上看征地带来了农户收入结构的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农户资源禀赋的差异,征地前后不

表 2 征地前后失地农户部分指标变动的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指标性质	指标名称	征地前后	均值/元	标准差	t 检验 P 值	
农业性	农作物产值	前	13 413.5	680.5	0.000 0	
		后	1 015.9	222.4		
	家畜养殖产值	前	5 535.1	823.0	0.000 7	
		后	2 783.0	825.8		
工资性	本地农业打工	前	688.1	173.6	0.169 3	
		后	861.0	209.2		
	本地非农打工	前	16 812.7	1 289.7	0.000 0	
		后	25 748.4	1 364.0		
	外地长期打工	前	7 802.5	847.1	0.003 4	
		后	9 762.0	1 027.5		
政府事业单位工资	前	1 935.2	343.6	0.000 2		
	后	3 359.7	571.3			
转移性	救济(民政发放的扶贫资金)	前	90.2	42.1	0.020 6	
		后	208.1	43.6		
	补贴(粮食、良种、农机等)	前	486.1	51.9	0.946 5	
		后	390.2	39.0		
	受赠(人情往来)	前	587.9	134.8	0.078 2	
		后	764.9	125.0		
	离退休养老金	前	788.6	149.5	0.000 0	
		后	1 638.9	192.2		
	财产性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等)	前	454.8	48.2	0.000 3
			后	717.3	79.9	
租金收入(房屋、店面、车辆等)		前	131.9	56.6	0.000 0	
		后	629.0	126.4		
股息和红利收入		前	13.1	6.9	0.239 8	
		后	19.7	12.2		

同类型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征地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为此,本文拟从农户“兼业程度”“劳动力规模”以及“失地程度”3个维度^②分类考察各个因素对失地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及其作用路径。

1. 不同兼业类型下失地农户收入结构比较

由图 1 可知,征地对“纯农户”和“农业兼业型”农户收入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且对农户的农业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变动的的影响最明显,对农户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动的的影响程度较低。失地后,“纯农户”的农业性收入比重由征地前 92.9%下降至 10.7%,而工资性收入比重由 4.1%提高至 62.4%,非农经营性收入由 0.1%增加到 12.2%,且征地后工资性收入(18 795.3 元)是农业性收入(3 223.6 元)的 5.8 倍;“农业兼业型”农户的农业收

入比重也由 59.9%下降到 7.4%,而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则增加了 39.9%,是农业性收入比重的 9.3 倍。虽然“非农兼业户”农户和“非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但两者的比重下降幅度相对较少(仅为“纯农户”的 34.2%和 7.3%),收入结构变动相对不明显。

从农户兼业类型的分布来看,征地后农户兼业程度的分化更加明显。“纯农户”比重下降了 17.4%(由 18.2%下降到 0.8%),“非农户”比重则上升了 63.9%(征地后的比例高达 90.8%)。农户兼业类型的分化与农户收入结构的转变密切相关,征地加速了农户兼业类型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兼业程度下农户收入结构的分化,最终农户兼业程度的差异化使得征地后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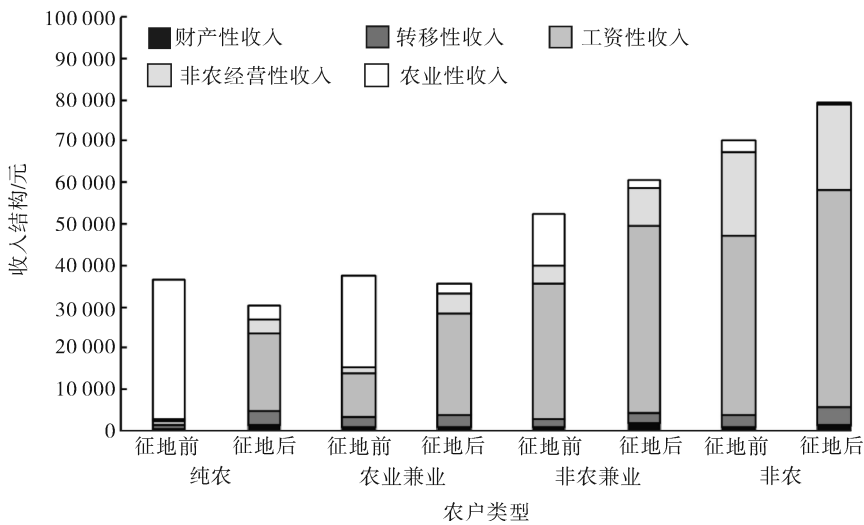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状况

2. 不同劳动力规模失地农户收入结构比较

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是有明显差异的(见图 2)。其一,家庭劳动力规模越小,征地对其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越剧烈,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性收入,影响最不明显的是财产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征地后,家庭劳动力规模为 1 人的农户农业性收入的比重变动最为明显,由 74.6% 下降到 7.5%,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则有所上升(增加了 18.8%),且转移性收入比重也明显增加,由 8.0% 上升至 52.0%;劳动力规模为 2 人的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由 37.5% 下降至 1.6%,

非农经营性收入比重和工资性收入比重分别增加了 17.1% 和 12.6%。其二,家庭劳动力规模越大,农户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高,征地后劳动力规模为 5 人的农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最大(28 745.4 元),劳动力规模为 3 人的农户工资性收入比重增加最明显(22.2%)。

进一步分析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可知,劳动力规模为 1 人的农户多由子女分家(或无子女)的老年人构成,这部分农户受教育程度仅为 2.9 年,征地后仍有 67.4% 的农户从事本地务农活动,且多有离退休养老金和子女及亲属给予的经济支持,政府也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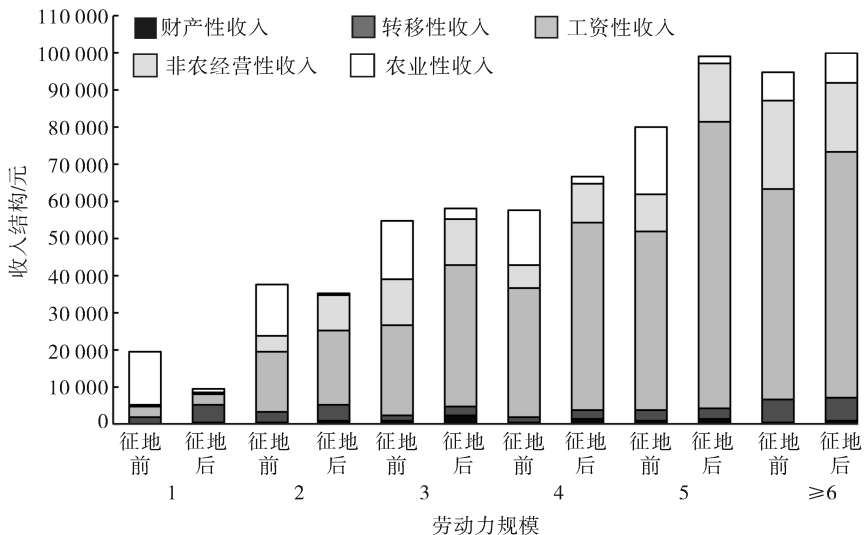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劳动力规模失地农户收入结构变化状况

这部分群体有所补助,故征地前后转移性收入变动极为剧烈。而劳动力规模为 6 人及以上的农户受教育程度比劳动力规模为 1 人农户多 5.5 年。此外,单一时间维度下农户劳动力规模与农户总收入是同步增加的,但多维时间下(征地前后)两者的动态变化却是不同步的,且教育程度高低与农户的劳动力规模呈显著性相关^③。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论,为了提高家庭资源禀赋以获取更多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农户可能会在家庭人口规模(子女数量)、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农户可支配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这必然会强化农户异质性,进而加深征地造成的不同劳动力规模农户收入结构变化的差异。

3.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收入结构比较

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收入结构变动是不同的(见图 3)。第一,失地程度越高,农户的农业性收入

变动越明显。征地后“较严重失地”农户的农业性收入比重下降了 19.6%，“严重失地”农户的农业性收入比重下降了 20.5%(仅占农户总收入 1.14%)，“轻微失地”和“中度失地”农户比重下降相对较小。征地后“较严重失地”和“严重失地”农户的农业性收入分别比“轻微失地”农户多减少了 4 248.9 元和 12 526.8 元。第二,失地程度越高,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增加越快,且“较严重失地”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比重最大(76.5%)，“中度失地”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均值最大(52 800 元)、增加数额最多(16 952.2 元)。征地对不同失地程度下农户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变动的并不明显。

失地程度是衡量征地前后农户自然资本变动和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失去土地则意味着失去资产,失去资产其生计活动就相应发生调整,生计活动调整带来收入结构和生计结果的调整。由于农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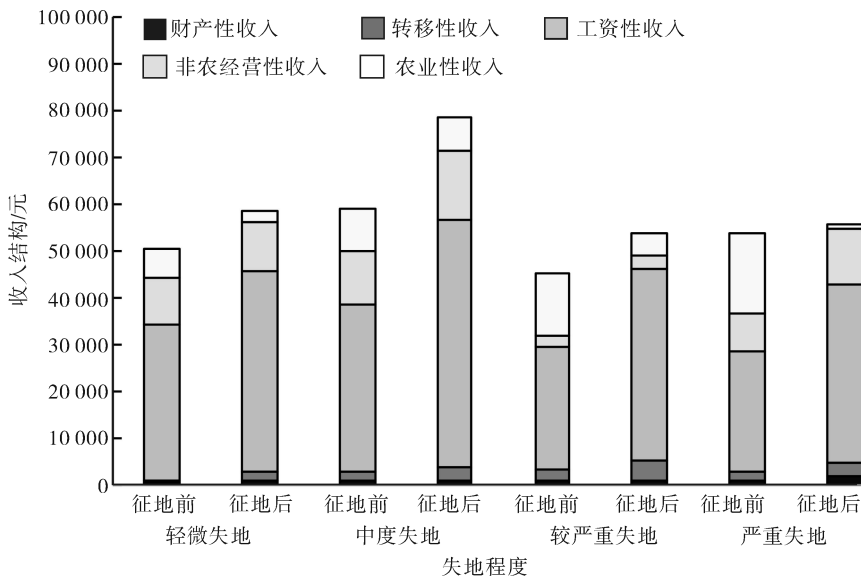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化状况

特征差异以及不同失地程度农户货币补偿安置政策的不同,不同失地程度下农户收入结构变化状况也不一致。

五、结论及讨论

本文基于九江和襄阳 621 户农户征地前后两阶段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及其变动情况。研究发现:第一,征地后农户总收入是增长的,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第二,征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于征地前,征地后

农户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了 19.4 个百分点,农业经营收入下降了 24.7 个百分点,失地农户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而且工资性收入更多来自本地非农务工活动。第三,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变动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而非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并不明显;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幅度越大;失地程度越大,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幅度也越高。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从以下方

面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失地农户收入及其结构的建议。

第一,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失地农户提供生计支持。本文研究表明,失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急剧下降,从而更加依赖于工资性收入以维持生计,因此为失地农户提供非农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地方政府定期为失地农户开展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尤其要加强弱势农户(如无土地且无劳动技能、无子女、无经济收入来源或遭受过重大家庭风险等)就业创业培训,增强其非农就业和适应劳动力市场能力,实现稳定就业与再就业。此外,对一些技术岗位和对口行业予以扶持,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团体介入,搭建专门针对失地农户的劳动力供需平台,将优质劳动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有效整合,从而降低劳动力流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并一定程度缓解失地区域内农户就业问题。本文分析还发现,失地后农户工资性收入更多地来自本地非农务工,失去土地后农户“离土不离乡”的情结比较严重,因此在原有的农村社区创造就业机会,为失地农业劳动力提供在本地非农就业的机会在短期内对于保障农户生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二,针对不同类型失地农户提供差异化的帮扶措施。不同类型农户失地前后收入结构变化明显不同,因此要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收入结构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例如,针对征地后仍然以农业为主的农户,要稳定和增加其农业性收入的同时,提高他们的非农创收能力,逐步引导他们由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生产模式向以非农收入为主转变。对半农业农户,要加强对他们的非农劳动技能培训,促进这部分农户生计方式的顺利转型,着力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对于非农户,要保障他们能够正常适应或融入城市和非农创收活动中来。

注 释:

- ① 对621户失地农户征地前后两阶段的各项收入来源进行差异显著性 t 检验的结果显示,征地前后,户均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农业总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非农业总收入存在显著差异(P 值为0.0000),而非农经营性收入和户均总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以看出,征地对农户收入结构中的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并不大。
- ② 对农户“兼业程度”“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等分类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回归分析,检验各分类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户兼业类型和家庭劳动力规模的 P 值均为0.0000,失地程度的 P 值为0.0229,这说明

参 考 文 献

- [1] 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6(1):128-134.
- [2] 钟涨宝,李飞,余建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社会学探析——基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J].农村经济,2009(2):104-107.
- [3] 冀县卿,钱忠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基于江苏省46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数据[J].江海学刊,2011(6):88-93.
- [4] 郭占峰,付少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困境与应对策略——以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34-37.
- [5] 孟祥斐,华学成.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江苏淮安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J].学海,2008(2):23-30.
- [6] 陈祝国,牟守国,丁忠义,等.徐州东部矿区失地农民生活水平变动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8(8):69-73.
- [7] 史清华,晋洪涛,卓建伟.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7村调查——兼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与改革[J].管理世界,2011(3):77-91.
- [8] 黄建伟,喻洁.失地农民关键自然资本的丧失、补偿及其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七省一市的实地调研[J].探索,2010(4):86-92.
- [9] 张晓玲,卢海元,米红.被征地农民贫困风险及安置措施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6(1):2-6.
- [10] 张科静,丁士军,黄朝阳.上升还是下沉——基于收入流动性视角的失地农户收入研究[J].学术论坛,2011(3):98-102.
- [11] PANT J, BENOY K B, KHONDKER M E J, et al. Can aquaculture benefit the extreme poor? A case study of landless and socially marginalized Adivasi(ethnic) communities in Bangladesh [J]. Aquaculture, 2014(1):1-10.
- [12] 成得礼,谢子平.中国城乡结合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人转型问题研究——基于北京市、青岛市、成都市和南宁市的入户调查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2009(3):64-73.
- [13] 周义,李梦玄.失地冲击下农民福利的改变和分化[J].农业技术经济,2014(1):73-80.

以上 3 个变量均对农户总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

- ③ 据调查,劳动力规模为 1~6 人及以上的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2.9 年、6.8 年、8.2 年、8.5 年、9.4 年、8.4 年。对农户劳动力规模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卡方检验结果: $Pearson\ chi^2(15)=33.99, Pr = 0.000 0$ 。

Land Requisition and Farmers' Income Structural Changes: An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Jiujiang and Xiangyang

DING Shi-jun¹, YANG Jing¹, ZHANG Ke-jing², ZHOU Jing³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3.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Incom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landless farmers is an urgent issue related to household livelihoods and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wo-step micro-survey data of 621 landless farmers in Jiujiang and Xiangyang, this paper first surveys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landless farmers' incom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al changes from different household occupation type, labor scale and land losing degre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after land-requisition was sharply decreased comparing with the land acquisition stage,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wage income increased sharply. After land-requisition, the livelihood of landless farmers are more depending on the non-farming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local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the changes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y different household occupation type, labor scale and land losing degree. The agricultural income of pure farmers and part-agricultural farmers dropp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art-industry farmers and non-farmers. The bigger the labor force is, the more serious the land losing degree becom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wage income increases faster.

Key words landless farmers; income structural changes; livelihood; heterogeneity

(责任编辑:陈万红)